

ECONOMICS

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经典译丛

经济学理论与 认知科学 微观解释

[美] 唐·罗斯 (Don Ross) 著

贾拥民 译

ECONOMIC THEORY
AND COGNITIVE SCIENCE:
MICROEXPLANATIO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学理论与 认知科学 微观解释

[美] 唐·罗斯 (Don Ross) 著

贾拥民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理论与认知科学：微观解释/ (美) 罗斯著；贾拥民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300-12943-3

I. ①经…

II. ①罗…②贾…

III. ①经济学-研究②认知科学-研究

IV. ①F0②B8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1119 号

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经典译丛

经济学理论与认知科学：微观解释

[美] 唐·罗斯 著

贾拥民 译

Jingjixue Lilun yu Renzhi Kexue: Weiguan Jie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8.75 插页 2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79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复杂的社会经济现实发生着持续的碰撞与融合，并不断实现着自我的内省与创新。尤其在进入20世纪后，经济学前期一百多年的发展，使得它此时已逐步具备了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和精湛的分析方法——一座宏伟而不失精妙的新古典经济学大厦灿然呈现于世人面前。这座美轮美奂的大厦，巧妙地构筑于经济理性与均衡分析两块假定基石之上，而经济学有赖于此，也正式步入了规范化的研究轨道，从而开创了它对现实世界进行解释与预测的新时代。

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日趋复杂与多样化，对经济世界认

识的深化自然亦伴随其中，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正受到来自现实经济世界的各种冲击与挑战，并在对许多经济现象的分析上丧失了传统优势。这些“异象”的存在构成了对主流经济理论进行质疑的最初“标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这也许是过去二十年内经济学领域最有意义的创新之一。

什么是行为经济学？人们往往喜欢从事物发展的本源来对其进行定义。行为经济学最初的产生动机是为了满足解释异象的目的，即从心理学中借用若干成熟结论和概念来增强经济理论的解释力。因而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与主流经济学相比，行为经济学不过是在经济学中引入心理学基本原理后的边缘学科或分支流派。然而，行为经济学近年来的一系列进展似乎正在昭示它与心理学的关系并不像人们初始所理解的那样。如果把它简单地定位为区别于主流理论的所谓“心理学的经济学”，则与其内在的深刻变化不相对应。为了能够对它与主流经济学的关系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首先必须了解它是如何解决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答的问题的。

主流经济理论丧失优势的原因在于，它所基于的理性选择假定暗示着决策个体或群体具有行为的同质性（homogeneity）。这种假定由于忽略了真实世界普遍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差异特征和不同条件下认识的差异性，导致了主流理论的适用性大打折扣，这也是它不能将“异象”纳入解释范围的根本原因。为了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行为经济学在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后，已逐渐明晰了它对主流经济学进行解构与重组的基本方向，那就是把个体行为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将理性假定下个体行为的同质性作为异质性行为的一种特例情形，从而在不失主流经济学基本分析范式的前提下，增强其对新问题和新现象的解释与预测能力。那么，行为经济学究竟是怎样定义行为的异质性的？根据凯莫勒（Colin F. Camerer）2006年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我们认为，行为经济学通过长期的探索，已经逐渐把行为的异质性浓缩为两个基本假定：其一，认为个体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其二，认为个体不完全是利己主义（self-regarding）的，还具有一定的利他主义（other-regarding）。前者是指，个体可能无法对外部事件与他人行为形成完全正确的信念，或可能无法做出与信念相一致的正确选择，而这将导致不同的个体或群体会形成异质的外部信念和行动；后者是指，个体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他人的行为与行为结果进行评估，这意味着不同的个体或群体会对他人行为产

生异质的价值判断。在这两个基本假定下，异质性行为可较好地融入经济分析体系之中。但是，任何基本假定都不可能是无本之木，它必须具有一定的客观理论支持，而心理学恰恰为行为经济学实现其异质性行为分析提供了这种理论跳板。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心理学的成果是揭示异质经济行为较为成熟的理论与工具，但不是唯一的，我们也注意到神经科学、生态学等对经济学的渗透。

经济学家对行为心理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斯密时代，就已注意到了人类心理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描述了个体行为的心理学渊源，并且展示了对人类心理学的深刻思考。然而，其后的经济学研究虽然也宣称其理论对心理学存在依赖关系，但其对心理学原则的遵从却逐渐浓缩为抽象的经济理性，这就把所有个体都看成了具有同质心理特征的研究对象。而实际上心理学对人类异质心理的研究成果却更应是对经济行为异质性的良好佐证。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将心理学原理纳入经济学分析的现状，实际上是对开展异质经济行为分析的诉求。但需要留意的是，经济学对心理学更多的是思想性的借鉴，而不是对其理论的机械移植，并且经济学家也正不断淡化着行为经济理论的心理学色彩，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行为经济学视为主流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形式，也不能将行为经济学打上心理学的“标签”。心理学的引入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它自始至终都是为主流经济学不断实现自我创新服务的。

我们还想着着重强调的一点是，行为经济学对心理学原则的引入和采用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密不可分。在行为经济学的早期研究中，来自心理学的实验方法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许多重大的理论发现均得益于对心理学实验的借鉴，甚至许多行为经济学家如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人本身就是心理学家。然而，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在范畴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之处。罗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认为，行为经济学家是方法论上的折中学派，他们并不强调基本研究工具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得自这些工具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学上的应用。而实验经济学家却更强调对实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的认可和使用。类似于计量经济学可理解为经济计量学，实验经济学也可理解为经济实验学，它是经济学实验方法的总称，并且是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实证基础来源。只有当来自实验经济学的实验结果被凝练为行为经济理论，才完成了经济研究从实验层面向理论层面的抽象与升华。与行为经济学相比，实验经济学似乎更接近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具有更为浓厚的工


具性色彩。

现在，我们可以初步对行为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相对关系做一评判了。纵观行为经济学的发展简史和其近年来的前沿动态，我们大胆地认为，近二十年来逐渐兴起的行为经济学不是区别于主流经济学的分支流派，而是对主流经济学的历史顺承与演进，是主流经济学在 21 世纪的前沿发展理论。行为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日益成熟，正体现了它对主流经济学从内涵到外延上所作的量变调整与质变突破——它通过借鉴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并从实验经济学中获取实证支持，而将个体的异质性行为纳入了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涵盖了以往的同质性分析。同时，这也意味着行为经济学并未把主流经济学排除于它的理论体系之外而否定其理论逻辑，而是使主流经济理论退化为它的特例情形。故而凯莫勒曾畅言：“行为经济学最终将不再需要‘行为’一词的修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主流经济学将会退出历史舞台。事实上，新古典理论仍然是行为经济学重要的理论基础来源和方法论来源。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作为更广范畴下的行为经济学的一个特例，将成为经济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参照理论。

鉴于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近年在国外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经济学科的重要意义，以及国内该领域相对滞后的研究现状，我们为国内读者献上了这套经过慎重选译的丛书。这套丛书囊括了近年来国外长期从事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的主要论著，读者从中既可了解到行为经济学各种思想发端和演进的历史踪迹，又可获得翔实丰富的实验方法论述及其成果介绍。同时，我们还专门为读者遴选了一些反映行为与实验经济学最新前沿动态的著作——这些著作涉及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学、博弈论、劳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领域。它们由于经受验证的时间较短，也许并不成熟完善，但却能使我们的研究视野更具有前瞻性。我们衷心地希望海内外读者同仁能够不吝赐教，惠荐佳作，以使得我们的出版工作臻于完善。

贺京同 汪丁丁 周业安

2009 年仲夏



致 谢

像本书这样一本跨学科的著作，需要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来保证其质量，不然作者就会像一个愚笨的外行或观光客一样，经常露出马脚。唯一能保证本书质量的只能是来自它所涉及的各学科同行的细细评鉴。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批评再怎么多、再怎么细，也不可能消除书中所有疏漏。因此，虽然已经从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认知科学家那里得到了极其无私的帮助，我还是做好了可能会身陷上述尴尬局面的心理准备。如果那样，就让批评来得更猛烈些吧。

Harold Kincaid 和 David Spurrett 阅读了本书的全部初稿，并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这本书篇幅不小，而且

读起来也不容易，他们为此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我不能不表示深深的感激。

还有不少人士曾经阅读和评论过本书的部分章节，他们是（排名以字母表顺序为序）：George Ainslie, John Collier, Dan Dennett, Paul Dumouchel, Dan Hausman, Yannis Ionides, Brian Kantor, Philip Mirowski, Alex Rosenberg。他们都是非常忙碌的人，因此我确实需要对他们再三致以谢意。Andy Clark 和 Robert Frank 对我以前发表的论文以通信和出版物的形式发表过评论，这些论文也被部分地融合到了本书当中，因此，本书的观点也因为他们而得到了不少改进。

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在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经济学院举办的研究生研讨会上，我的学生们也曾经阅读、讨论、批评过本书的主要章节。他们的努力也使本书增色甚多。

本书部分内容曾经在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Eastern Division）、加拿大哲学学会（Canadi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南非哲学学会（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Africa）和“逻辑、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国际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等会议上宣讲。我还曾经应邀在科学哲学杜布罗夫尼克年度研讨会（Dubrovnik Annual Workshop）、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夸祖鲁-纳塔尔大学（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魁北克蒙特利尔大学（l'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和罗德大学（Rhodes University）对本书的一些内容作过报告。我感谢在这些报告会上认真听讲，而且提出了很多批评的听众。

第5章的部分内容曾经发表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博弈论”条目下（<http://plato.stanford.edu/>）。我感谢《哲学研究》编辑部允许我在此重印《为什么人都是非典型主体》（“Why People Are Atypical Agent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31, no. 2, March 2002）一文中的某些内容；感谢《理性与社会》编辑部允许我在此重印《诚信只是一致性——答罗伯特·弗兰克》（“Sincerity Is Just Consistency: Reply to Robert Frank,”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 16, 2004, pp. 307–318）一文中的某些内容；本书还包括了我发表于《语言科学》上的论文《社会个体相互协调的元语言信号》（“Metalinguistic Signaling for Coordin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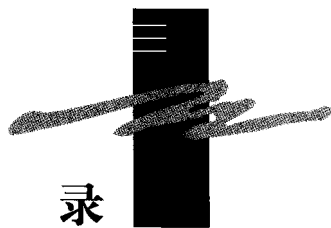
amongst Social Agents,” *Language Sciences*, vol. 26, 2004, pp. 621 - 642) 的某些内容，我在此感谢《语言科学》编辑部的授权。

感谢 Dan Dennett 和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 Tom Stone，本书的诞生，与他们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还要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 Judy Feldmann，他的编辑工作既细心又有效率；还要感谢 Jessica Lawrence-Hurt 对这个出版项目的组织和管理。

我最需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 Nelleke Bak 教授，我欠她的实在太多了：她校对并编辑了全部的手稿；当我在世界各地漫游时，是她代我处理了与本书有关的编辑事务；我长期待在国外，她也十分体谅；当我只知道坐下来思考效用最大化问题时，是她支撑着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安然度过了动荡期并日益改善。这本书的许多想法都是在与她的讨论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而且有许多愚蠢的想法在真正面世之前都被她这个精准的“过滤器”过滤掉了。如果有些荒诞的观念最终还是出现在了这本书当中，那也只能怪我顽固不化，因为那都是我不顾她的反对执意为之的结果。

唐·罗斯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经济学的未来与统一	
科学.....	1
哲学的和历史学的.....	1
科学与人类世界	18
本书的论证策略	33
第 2 章 哲学入门：意向立场功能主义	
与真实模式	38
意向性	38
分体论	56
真实模式与意向立场	65
第 3 章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独立	75
.....	75
作为独立科学的经济学	75
前经济学	78
边沁与感觉主义	80
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与“半亚里士多德主义”	84

实证主义基础：莱昂内尔·罗宾斯	93
萨缪尔森与行为主义	107
什么样的独立科学？	122
第4章 有关显示偏好和效用理论的哲学问题	128
古老的新时代精神 (new zeitgeists for old)	128
显示偏好理论不行了吗？阿马蒂亚·森对效用 函数的心理学基础的分析	133
为套套逻辑欢呼的两个理由	147
成熟的新古典主义：加里·贝克尔的研究纲领	156
第5章 实验经济学、演化博弈论与取消主义的 可行性	175
经济学实验室中的人	175
探索式判断 (工作集 1；问题集 1)	179
自然统计能力 (工作集 1；问题集 2)	181
检验期望效用理论及其替代 理论 (工作集 2；问题集 1)	183
偏好逆转与偏好时间不 一致 (工作集 2；问题集 2)	185
总体市场 (aggregated markets) 中的理性 (工作集 3)	198
从行为经济学到取消主义的道路	199
第6章 个人主义、意识与主体	221
从合理的启发式教学法到不合理的形而上学	221
个人主义、洛克式的内省、现代心智模型	229
意识的多重草稿模型	241
主体性与人格：各种完全不同的观点	245
走进世界：移除控制源	265
第7章 自我及其博弈	273
“自我残骸”之调查 (survey the wreckage)	273
马基雅维利智慧 (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 与简单主体的崩溃	278
自我是什么？	286
博弈的确定	297
博弈确定的一个例子：情感信号传递	304

第 8 章 理性主体与理性自我	323
整合	323
自我与主体 1: 神经元经济学的启示	327
自我与主体 2: 微微经济学的启示	340
理性与解释适应主义	359
经济学适应主义	374
第 9 章 罗宾斯-萨缪尔森论证模式及其对话者	380
罗宾斯-萨缪尔森论证模式	380
帝国主义, 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抵制: 杜普雷	384
经济学理论与认知科学: 米罗斯基的鉴镜	390
参考文献	398
索引	420
译后记	440



第1章 导论：经济学的 未来与统一科学

哲学的和历史学的

本书是一项两卷本研究计划的第一部分，该计划从经济学与其他行为科学分支学科的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学（该研究计划的第一卷是“经济学理论与认知科学：微观解释”，第二卷是“经济学理论与认知科学：宏观解释”）。与通常思路不同的是，本研究计划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假定“经济科学”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

当然，现实中确实存在着所谓的“经济学”研究，它涉及多种多样的活动，消耗了非常可观的“人时”（person

1

hours)。大部分经济学研究活动都与对现实政策的分析以及由此衍生的争论有关，另外一部分则主要与对各种社会福利变量和个人福利变量的度量，以及对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探究有关。至于这些可以区分开来独立地加以考察的变量，则都与可观察的数据有关。在任何一种有意识地提供预测的理论体系内，变量及其关系要保持相对稳定，不然就不能为不同的情形提供参照系。这种理论体系就是一门科学，我们所说的经济学也是如此。本书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使经济学这一学科成为一门健全的经验科学（a sound empirical science），需要怎样的一种解释框架（如果存在这种解释框架的话）？

在此，我必须把提出这一问题的着眼点阐释得尽可能清晰一些。在实践中，绝大多数“经济学”活动都是极有价值的，对此我毫不怀疑。根据达斯古普塔（Dasgupta, 2002）提出的强有力的理由，我认为对经济学的许多攻击——无论是从通常流行的大众观点着眼的，还是从哲学的、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的，抑或是意识形态化的——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忽视了真正的关键点，即认定一门科学（经济学）是好的科学还是坏的科学，标准在于任务领域（task domains）中基于实践的经验判断，而不在于该学科的参与者能否以哲学上严格的、经得起反驳的、明确的公式来把基本理论框架表达出来。因此，本书的目标，绝不是要去告诉经济学家，他们应该从根本上改变方向了。这并不是“方法论”一词在经济学文献中的通常含义。本书讨论的是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学这种理论，本书将予以细细探询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有的话，）它所进行的、用于指导实践的合理经验探究（empirical inquiry）属于哪种类型？即使据以构造解释的理论可能导致某些误导性的推论，实践本身也往往（或通常）可以很顺利地自我展开。这种想法是完全符合一致性原则的。

这种情形在最细致的科学哲学中实属常见。然而，这种探究也并不是纯粹的科学哲学问题，它是一种理性重建活动，无需更多、更进一步的现实动机。虽然我并不想把本书写成一本“经济学理论基础”之类的著作，但是，我仍然想去探索经济学理论与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基础之间的联系，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实践型”经济学家承认这些学科与他们的日常研究活动实际上是相关的。我已经发现大量可以证明这种关系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事例，因此我相信我的研究对于那些认为他们应该进行实证研究的经济学家来说，很可能是有意义的。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提倡另一次“范式转变”。我绝无这个意图。

广义地说，对于一门学科，要为其建立一幅内在一致的、连贯的“学科图景”，有两种策略：第一种是哲学的策略（philosophical strategy），第二种是历史学—社会学的策略（historical-sociological strategy）。在有限的理想情形下，第一种策略就是，围绕一门学科是怎样组织成一个相互紧密相连的命题系统的这一核心问题，把整个理论体系呈现出来。其中，有些命题是关于经验世界的（或者说它们至少试图建立起一些关于经验世界的命题），另外一些命题则是有关其他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证据关系的。这一策略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如何试探如下问题的可能答案：哪些命题是整个学科结构中必不可少的关键命题，哪些命题则是可有可无的；同时，当这一学科被应用于实证案例时，那些被认可的逻辑关系和证据关系有多大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同样在有限的理想情形下，第二种策略是，构造故事并为之提供一些理由：为什么人们会偏爱有关一门学科的某种特别的叙事（它可以解释这门学科发展过程中参与者的活动）。这一策略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当需要判断谁可以被视为该学科的参与者，谁又不是的时候，如何为这种判断辩护？而且，在不同时期，典型的参与者及其活动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改变？

上面我在刻画这两种策略时，描述的是有限的理想情形（limiting ideals）。我认为，要想比较全面地了解一门学科，需要同时混合运用这两种策略。当然，如何突出重点同时又保持双方兼顾，需要高度的技巧，这里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

在本研究中，哲学的策略被赋予了某种解释优先性（explanatory priority）。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支持如下的假设：历史上推动学科发展的，更多的是逻辑动机而不是心理动机和社会动机。（当然，我也不支持相反的假设。）这只不过是研究主题的一种选择，因为本研究想回答的问题是：经济学是关于什么的？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不是清晰的？它的研究领域是怎样与其他很明显与之密切相关的学科领域区别开来的？至于经济学这门学科为什么能发展起来，它是如何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这些并不是本研究所主要关注的问题。

尽管如此，本书的前半部分仍然是按时间顺序来叙述的（当然是有选择地）。既然我瞄准的主要是哲学的目标，而非历史学—社会学的目标，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阐释方式呢？答案如下所述。近来在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研究领域中，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张力，它出现在“辉格党式”的历史叙述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叙述之间。前者

(whiggish) 讲述的是一些进步的故事（当然，它也允许出现若干“走进死胡同”、“误入歧途”，以及“浪费时间”的片段）。科学哲学家（比如说我自己）倾向于采取“辉格党式”的叙述方式，不过这只是因为我们想努力去挖掘出深层的逻辑结构，而逻辑结构要成为一个结构（structure），必须保证大体上连贯一致。因此，有关的故事必然是一种建构（construction）。这种叙事的目的与这种哲学态度相符。有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所以会想当然地认定这种做法过于幼稚，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囿于学科偏见不能自拔，或者坚持了一种不那么真确的经验假设——逻辑从来不会促进理论的发展。

然而，假设一些事物符合目标，并不意味着一切事物都符合目标。以经济学来说，最自然的一种叙述就是讲一个“辉格党式”的故事，比如说可以讲数理模型和技术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故事。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学中的数理模型和技术都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对这个事实，没有多少人会提出严肃的反驳。更进一步说，既然能够被人们充分理解的命题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透明的——这正是数学的优点之一，那么较早的分析技术与较晚的分析技术之间的关系，也就算不上是典型的猜想或诠释学解释（hermeneutic interpretation）问题了，虽然要明确地说明它们需要付出很大的理论努力。本书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按时间顺序来叙述的，它们就是围绕着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的改良进程来组织的。

不过，我并不会提出一种“辉格党式”的假说，说这种改良所带来的效应，对于经验科学来说，必定是有益的、重要的、深刻的。恰恰相反，我将提出一个问题，一个批判性问题：这些不断改良的技术手段，是不是真的将改进经济学对更深刻的经验规律的探索呢？我在这里所说的“改进”（improving）一词，是在其宽泛意义上使用的，“改进”是指描述得更准确、细节更丰富，同时便于给出更有力的解释。整个故事叙述完毕之后，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重新回到这个哲学问题上来，以对其进行更严肃的讨论。

无论是从哲学的角度，还是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对经济学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批评，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那些把持着经济学学科范式决定权的人，对精致的数理分析技术始终如一地、毫不含糊地表示赞赏，而对理论对于经验现象的回应能力却不怎么在意。并不是所有学科都是如此，不过就经济学而言，这种现象正是我以这种方式来展开研究的原因。任何同意上述观点的人，只要不站在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立场